

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所有设备，均购自德国。当时投资累计已超过1亿元银币，一切由杨宇霆总其成，有东方“克虏伯”的称号。“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被日军全部占领，库存的步枪8.7万多枝，机关枪4000多挺，飞机200多架，及所有的粮秣弹药等，均被日军抢掠一空。更为痛心的是，以后日军所用的主要武器，大半取给于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六辑）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阴谋活动

王子衡

我从1919年起，同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九·一八”事变时任日本海军省政务次官）在大连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关东报》，并任总编辑。“九·一八”事变以前，我还在辽宁省政府兼了一个咨议的名义。因此，我同日本军政各界人物和东北方面的臧式毅、于冲汉、袁金铠等亲日分子皆有联系。

永田善三郎透露的日军侵占东北的消息

1931年7月发生所谓“中村事件”后，日本军人、政客、财阀、学者等前来我国，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旅行视察，特别频繁。8月中旬，永田善三郎到中国各地旅行后，归途路过大连，在大和旅馆找我闲谈。他开口就说：“时机到了。”我问：“什么时机？”他说：“也可以说是你出头露面的时机到了。”我越发不得其解，追问：“我怎样又会出头露面呢？”他说：“我

知道你十几年来不是曾经奔走奉天（沈阳）、北京各军阀官僚之间，总想弄个一官半职，在政治舞台上露露头角吗？我看你这个愿望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实现的。”我说：“你的话我始终不解，请你明白说了吧。”他说：“我今晚无事，我们到星乃家（日本料理馆）喝酒去。”

当晚，我如约前去。永田和我边饮边谈，他突然激动起来，拍桌骂道：“张学良这小子太混蛋了，这么大的满蒙地方不去好好治理，却勾结蒋介石，跑到北京胡作非为。我看他的命运将和他老子张作霖一样，永远回不到奉天（沈阳）了。他仇视日本，欠下日本的债务不还，订立条约也不履行，还想拉拢英美来抵制日本，因而对于日本人不理不睬。我这次到北京时，本来和他已事前约定接见时间，但是届时他却派出他的秘书叶弼亮对我说，‘副司令现有紧要事情，不能见你，你如果有什么话，请告诉我，我可以转达’。岂有此理，张学良太骄傲了！最近我们日本军人、政界、财团、学者们来中国视察，常常受到他这样的待遇。我看他大祸临头，还不自觉，他是下决心不要满蒙的老家了。”

我说：“照你说，东北将有什么政变吗？日本将参加这个政变吗？”他说：“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学者和各方面的舆论，已一致认为满蒙局面必须改变一下，不然日本在满蒙的生命线将遭到危险，受到损害。”我说：“那么说，日本将积极参加这个政变，这样做，不会惹起国际问题吗？”永田说：“满蒙这块地方，是日本流血换来的，是日本的生命线，只有日本有权利管理它，其他国家无权过问。如果没有强大日本存在，整个满蒙早已沦亡了，不归俄国独占，也必成为国际共管，早已不归中国所有了。张学良这小子妄自尊大，胆敢不理日本、仇视日本，最近杀害中村大尉，还想狡赖，敷衍行事。日本朝野，怒

不可遏。你想这事能放过去吗？”我说：“那么，继张学良之后的将是谁呢？”永田说：“你先不必问，到那时自然会明白的。中国人应该想想，如果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打败满清，战胜俄国，成为今日的强大帝国，不仅满蒙早已不保，即整个中国也早已完全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了。老实说，从我们日本人看来，满蒙非中国的土地，中国也不成为国家。你想想，世界上哪有一个独立国家里会有外国的租界、外国的军队、外国的治外法权、外国的工厂矿山和铁路等等存在呢？中国哪一次政变，没有外国人参加，哪一个政党，没有外国人在后边撑腰呢？满蒙是个富饶的地方，但近年来叫张作霖父子搞得民困财竭，而张学良丝毫没有悔祸之意，却袭用中国历来远交近攻的老一套政策来对待日本，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况且苏联继承俄国的侵略政策，逐年向满蒙扩张势力，企图赤化整个中国，影响所至，祸及日本，日本能够坐视不理吗？以日本强大的兵力，一星期内可以拿下整个满蒙，两个月内可以拿下整个中国。现在所以不这样做，一方面是在等待张学良翻然悔悟，跟日本亲善合作；另一方面是不忍中国人民陷于巨大的兵祸。但是，现在已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这次到中国各地视察，看到中国形势日非，新旧军阀火并恶斗，连年不休，去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互相混战，还没有结束，而张学良又于9月卷入战事，帮助蒋介石攻击阎冯联军。现在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和广东政府的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又发生新的战争，而阎锡山的败将石友三投降张学良后，现又瞅上机会，勾结广东政府，通电反对张学良，顺着平汉路进攻天津。我看石友三将军一定会胜利，因为他现和我们日本很要好，又和张学良的族弟张学成联合一起。关里关外，两路夹攻，张学良老家的地盘就发生动摇

了。但是，张学良还没有什么觉悟，却把关外的残兵烂将大批地调进关内参加内战，攻打石友三，东北防务非常空虚，如果日本略一举手一投足，满蒙天地不仅已非张学良所有，恐将也非中国所有了。”

“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社”

永田接着就谈到了“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和“雄峰社”这两个组织的由来。他说：“满蒙这个地方，日本于日俄战争时不仅牺牲了无数的宝贵头颅，流了大量的鲜血；在战后又投下了20多亿元的资本，开发满蒙产业，东北经济才有像今日这样的繁荣，中国人的生活才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张学良得有今天这样的势力，也就是他继承他老子张作霖的遗业，直接间接地受到日本的支援的结果。至少张学良应当饮水思源，感激日本才是。但是相反的，他却蔑视日本、仇视日本。例如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原是日本外务大臣、伯爵贵族，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很高，也是国际上知名之士。他在今夏就任满铁总裁，初度巡视满铁沿线各地，到奉天时拜访中国军政各方面人物。张学良虽在北京，不得会见，而其代理人荣臻、臧式毅等对他很冷淡，没有什么招待。这不仅对不起内田总裁，也是日本的耻辱。在国际礼节上，这也是说不下去的事情。全体满铁五万多名社员都因此而异常激愤。”

永田告诉我说，内田康哉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非常愤怒，回到大连满铁公司号召满铁5万青年社员要认清时局，提高警惕，组织起来。因此满铁日本青年社员包括在东北各地的日本青年在内，多响应内田的号召，以满铁公司卫生课长金井章二、文书课长中西敏宪为首，组织了一个“在满日本青年联盟”，从大连满铁公司本社到长春沿线，包括各方面日人在内拥有会员

1万多人（本书编者注：此处有误，满洲青年联盟1929年即成立了）。他们经常开会，通过决议，发出“满蒙是我们日本人的满蒙”，“满蒙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生命线”，“日本今天在满蒙的地位是大和民族用鲜血换来的，不容他人蔑视，更不容他人干涉，”“我们以鲜血换来的满蒙，现在须有以鲜血保护它的决心”，“经营满蒙，开发满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神圣天职”等等口号，广泛进行宣传鼓动。

同时满铁社内的日本青壮社员，又有一个以笠木良明为首的“雄峰会”组织，约有会员1000多名，都是专业及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大亚细亚主义者，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整个亚洲民族的历史和它的命运及现在所处的境遇。他们常说：“拯救亚洲各民族的任务，划时代地落在日本民族的肩上。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人应觉悟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领导亚洲各民族团结起来，打击无色人种的侵略尤其赤俄的侵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容许无色人种在我们卧榻之旁鼾睡。”

至此永田又对我说：“你可能看到在满铁的《协和》杂志上常常载有‘亚洲是我们亚洲人的亚洲’、‘打倒白色（白种人）的侵略’、‘打倒赤色（苏联）的侵略’、‘亚洲民族的命运与大和民族的责任’、‘匪人之子（指张学良）是否应为满蒙的统治者？’‘哪个民族对于满蒙最有发言权？’等等为题的文章。王先生，你要认识到日本这些青年都是有志之士，这样喊叫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青年联盟、雄峰会这两个组织的分子后来多为伪满的各部局省市县的首脑者）。我看满蒙局面将有巨大变化，希望你注意形势，要抓住机会露露头角，一展平素胸中的怀抱，不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应有思想吗？我所以说你的出头露面的机会到了，理由就在于此，哈哈。”

我也笑着说：“谢谢你的关怀。听了你这番话，我对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已明白了一些。日本田中义一大将的奏折的精神，我也是知道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时机吗？实现起来不会惹起国际问题吗？日本在军事上已有充分的准备吗？”

永田冷笑着说：“你的脑筋太迟钝了，你对日本实力的估计太轻视了。现在这样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形势，日本一定会抓住的。首先说，日本在满洲的兵力已有4万多人，分驻在旅顺、大连湾（柳树屯）、海城、大石桥、沈阳、铁岭、公主岭、连山关等地，控制了整个辽宁、吉林两省的各重要城市和铁路线。以这样强大的日本兵力，对付张学良现留满洲的土鸡瓦犬般的残兵烂将，真像摧枯拉朽一样，48小时以内可以占领整个满蒙。加上朝鲜驻有日本陆军3个师团（编者注：应为2个师团），一声令下，可以立刻跨过鸭绿江来。张学良的军队现在正被石友三军拖住，一时调不回来。张学良又与蒋介石明合暗不合，蒋介石虽然靠近美国，但他和日本也早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抓住了蒋介石的弱点，就是扶植他的势力，共同防共。”

他又说：“至于谈到国际方面，日本陆军的强大是世界无敌的，多年来的训练主要目标在于苏联。苏联内政不修，人心不服，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很困难，现在它不敢动。即使敢动，日本陆军过去能打败白俄，现在更能容易地打败赤俄。日本海军在数量上虽与美英海军为五五对三之比例，但在实力和质量上日军海军已成为太平洋上的霸王，美英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世界所公认的。请你相信我的话，早作准备。我敢保证，你的时机已快来到了。在必要时，你可以去见满铁顾问高柳保太郎。他虽是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对于满蒙事情和国际形势可能比我熟悉，你也认识他，时常同他谈谈，对你会有帮助的。”

日军准备发动事变和高柳保太郎的一段谈话

我听到永田的话后，仔细观察局势，益发感觉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8月下旬关东报社得到消息说，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移向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大演习，同时驻在满铁沿线的关东军也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但是关东厅警务局通令各报社，凡关于日军的各种行动不经警务局的许可，一概不准登载。接着，报社又得到满铁沿线日本守备队大批集中在沈阳苏家屯和在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的日本在乡军人已奉密令纷纷向各地报到的消息，这些消息也不能登载。此外，所谓“满洲青年联盟”和“雄峰会”等组织在大连、沈阳、长春连日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说什么“近来不祥事件累出，万宝山事件还没有解决，中村事件又复发生。张学良存心挑衅，不负责任。我们在满洲的日本人生命且感危险，没有保障。我们已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了，应当赶紧起来，采取适当的措施，保卫我们日本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才不负我们先烈流血牺牲换来这块土地的代价”。同时，居住大连和满铁沿线各地的日本居留民也纷纷开会，说什么“中村事件就是张学良否认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存在的表现。胡匪的淫威逼人，已杀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已经没有保障。我们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不能坐以待毙，有辱祖先，起来斗争，杀此贼子，谁还说

不应当呢。”

在东北的日文各报，每天用大字标题成篇成幅地大肆宣传鼓动，大骂张学良“远交近攻，勾结美英对抗日本，他既承袭乃父张作霖的事业，而对乃父同日本缔结的各种条约，如吉会铁路的修筑借款3 000万元，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农矿权利借款3 000万元，满蒙四铁路修筑借款2 000万元，既不还本，也不

付息，更不让日本履行已获得的开发吉黑两省产业和筑路的权利，这种背信弃义的胡匪行为，必须给以实力的惩罚……。”

我当时在关东报社里接到这些消息，认为时局确实紧张起来，当即走访满铁顾问兼弘报系主任、退役的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问他时局究竟会怎样。高柳干笑了良久，才徐徐说道：“会怎样，还没有什么难以明白的。只是我们日本人自中村事件发生后，都感到自己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希望张学良基于中日必须亲善的精神，负责任保护日本侨民和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权利。如果得不到满足的答复时，日本也就无法再客气了。张学良如果是个聪明的孩子，应当赶快觉醒过来，讲求保存实力的方策，否则他的命运如何，恐怕谁都能断定的吧！”

臧式毅的不抵抗主张

9月上旬，日本军竟在沈阳城北开始演习，并在北边门外架起机关枪演习市街战、夜袭战，向中国示威。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视察满铁沿线各地，检阅部队，并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在南满车站前和商埠地交界地区架起大炮，炮口对着沈阳城，满铁本线和安奉线已阻止中国人来往。我接到这些情报后，即由大连到沈阳，面见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当时我兼任辽宁省政府咨议，每月白拿200元，随时可以见臧式毅）。我问：“东北形势这般紧张，当局有什么妥善的对策没有？”臧式毅叹息地说：“日本企图侵占整个东北，处心积虑，已非一日。它在东北的势力已根深蒂固，这是你也知道的。现在形势日紧一日，我们军政两方面的负责人已把详细情况报告张副司令和南京中央政府，一切只有遵从张司令和中央的指示相机处理。”我又问：“万一日本不顾一切，实行进攻，主席将怎样办呢？”臧式毅说：

“你想想，我们自己正在关里打得不可开交，东北可用的军队大部分调进关里，留下的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部队。万一日军攻打上来，我们东北方面是腹背受敌，怕是招架不住。为了息事宁人起见，我方尽力忍耐退让，不使发生事故。万一发生事变，也不欲使事件扩大，只有敌来我走、敌退我守之一策。张副司令和中央的意旨也是如此。我们身为地方官吏，守土有责，本应作一种积极的打算，才不负人民的委托。但是东北不仅是我们的东北，而是东北人的东北，更是全中国和全国人民的东北，我想中央政府必有妥善的应急办法。”他说到这里，反问我：“你看时局能怎样？”我说：“日本人向来是沾边必赖的（实际上不仅是沾边必赖，而是无端侵占），这次不得便宜，怕是不能完事的。”臧式毅说：“关于中村事件，我们已承认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但是日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强硬要求我们履行过去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的所谓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这是我们无法承认，也是无权承认的。事已至此，只好听之。但我决心不作卖国的勾当。”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

花谷正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话：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通称“满洲事变”），是从柳条湖事件即沈阳事件开端的。花谷正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都是密谋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核心人物，也是日